

docstiver 文川網
入駐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網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于成龍集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1398126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于成龍集

李志安 主編

山西古籍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 139812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成龍集 / (清) 于成龍著; 李志安主編; 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點校.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 6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ISBN 978 - 7 - 80598 - 873 - 3

I. 于… II. ①于…②李…③閻…④蕭…⑤趙… III. 政書 - 中國 - 清代 IV. D 691. 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8) 第 088527 號

于成龍集

著 者: [清] 于成龍
主 編: 李志安
點 校 者: 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
責任編輯: 落穠香 李永明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 21 號
郵 編: 030012
電 話: 0351 - 4922268 (發行中心)
0351 - 4956036 (綜合辦)

E - mail: sj@sxpmg.com
網 址: [thhp://sjs.sxpmg.com](http://sjs.sxpmg.com)

經 銷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新華書店集團有限公司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團·山西新華印業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25. 75
字 數: 500 千字
印 數: 1 - 3 000 冊
版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 7 - 80598 - 873 - 3
定 價: 120. 00 元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按姓氏筆畫排序)

馬大正 于沛 朱誠如

成崇德 李文海 陳樺

鄒愛蓮 孟超 徐兆仁

戴逸

《于成龍集》編委會

顧問：薛延忠 劉澤民 金道銘 胡蘇平 高建民 楊安和

郭海亮 張平 令政策 薛軍 姚新章 閻愛英

姜新文 孫躍進 聶春玉 董洪運 張九萍 張陸緒

徐改清

主任：聶春玉

副主任：董洪運

委員：岳培民 薛萬明 朱錦平 丁雪峰 李志江 劉明勇

吳志國 王琦 劉保明 呂改蓮 曾廣超 李秀峰

張中生 成錫鋒 王盛章 成星明 李志安 武中平

郭潤保 王若東 王月明 劉俊祿 林祥

主編：李志安

副主編：閻鳳梧 趙桂溟 馬俊梅

成員：蕭泰芳 李豫 張志華 倪瑞星 劉春麗 張瑞雪

宋建軍 張亞平 王衛中

點校：閻鳳梧 蕭泰芳 趙桂溟

于精築公讚像



巖_レ正性螭_レ邀風挺不淫不屈之氣染貞
 特立獨行之心骨_レ些_レ眷采_レ於保殘歷險之地
 滕仔肩_レ於遺大投艱之中蓋張忠定之不飾
 玩好魯簡肅之術_レ履忠傳獻簡之遇人以
 誠范忠文之中_レ無弗容_レ公殆各兼其敏而古
 人與_レ回_レ余更_レ欣_レ瞻_レ其_レ貌_レ而_レ如_レ見_レ其_レ衷

沁州吳璵拜題



康熙本《于清端公政書》
 于清端公遺像後吳璵題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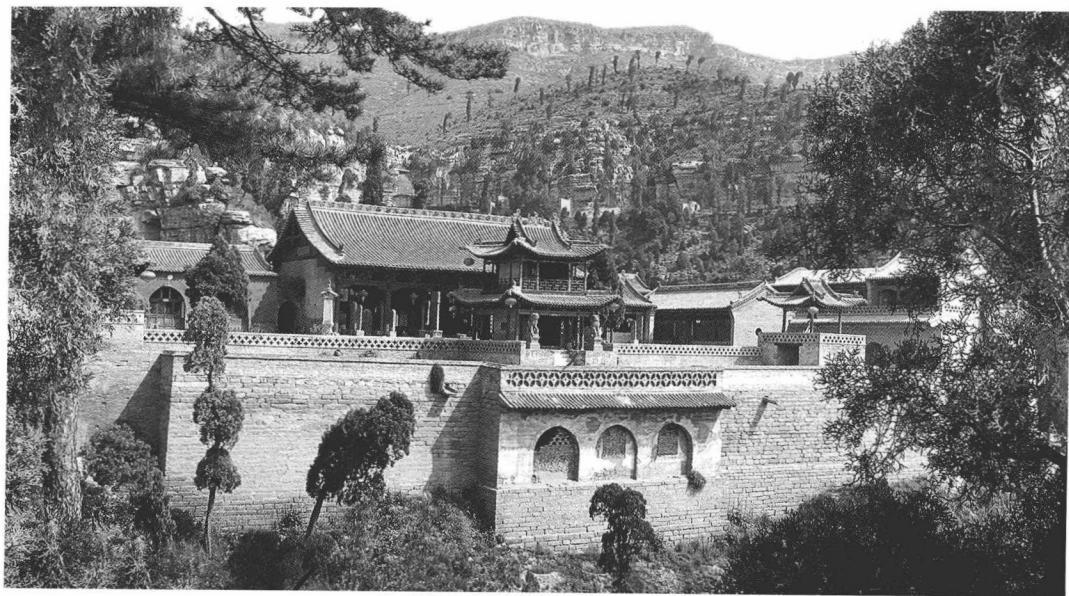
于成龍故里——山西省方山縣來堡村全貌



康熙皇帝手書賜匾——高行清粹（拓片）



乾隆皇帝手書賜匾——清風是式（複製）



于成龍少年時代讀書處——山西省離石區安國寺



廣西羅城縣于公舊治摩崖石刻



于成龍詩碑（現存山西省平定縣固關村）

凡 例

一、本書《于成龍集》原名《于清端公政書》，康熙四十六年(1707)，由于成龍長孫于準在于成龍門人李中素編輯之《于山奏牘》基礎上擴充、抄錄，蔡方炳、諸匡鼎重新編次、校對，分爲首編、政書(八卷)、外集，此謂康熙本。乾隆二十六年(1761)，于成龍曾孫于大樞增刻續集，連同康熙本原版重印。鑒於《政書》第八卷爲《吟詠書》，收錄詩、詞、散文，與“政書”之名不甚相副，且于成龍之名較之于清端公更廣爲人知，故本書改稱《于成龍集》。

二、本書用康熙本及其續集作底本，原書序、跋、卷、集、附錄、補遺等編排順序，一如其舊。《四庫全書》錄入《政書》八卷，名爲《于清端政書》，其餘未收，且有篡改、刪節、書寫錯訛以及漏收文字，本書僅作參考，不作校本。惟《政書》第八卷《過虞姬墓》其二末句“空令死血舞紅妝”中之“死”字，依四庫本改作“妃”字。

三、本書增補于成龍撰《建宋賢祠引》一篇，編入《政書》第八卷《吟詠書》之末；其他與于成龍有關之史料三十篇、詩二首，編入本書增設之“新補”中，均注明出處。新補文字大致按文章類別與寫作年代編排，無寫作年代者，按其所在之總集版本年代編排。

四、《于清端公政書》首編有目錄，《政書》目錄分別列於各卷之首，外集、續集無目錄。本書統一編目，置於全書之首。

五、短篇一般不分段，長篇適當分段，以便閱讀。

六、爲適應普通讀者需求，本書斷句從短，標點從細。公文輾轉、人物對話，以及專用詞語如“三舉卓異”、“奉公奏最”、“苟四知之克嚴”之卓異、最、四

知等等，一律加引號；概述大意、引文不全者，不加引號。各級官署、官職名稱如“州縣”、“州府”、“部院”、“督撫”、“司道”、“廳縣”、“衛備”等，非事有專指，一般不用頓號隔開。文中夾注，另加標點。

七、依照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整理工作通則》之要求，古體字、通假字、異體字、俗體字（含與今之簡體字相同者如于[於]、決[決]、爭[爭]等），以及一篇之中一字而多體者，一般不作改動；偶有改動，以不發生歧義與異音為準。對少數民族之污衊性稱謂，為保留歷史原貌，不作改動。

八、避諱字、缺筆、添筆，以及音義、筆畫相同，而上下、左右結構不同之異體字，改為通行字。

九、錯字加圓括號，隨後之正字加方括號。校補缺字用方括號，衍文用圓括號。本書此類情況顯係誤刻、漏刻，極易辨別，對理解文意並無大礙；且在本書內大多可以互證，閱讀同類文字，即可一目了然，故不必再作校記。如“彭百（鈴）[齡]”、“鮑世（榮）[庸]”、“衛（濟賢）[既齊]”、“順治十（三）[八]年以副貢知羅城縣”、“期七（日）[月]起事”等等，均屬此例。原文殘缺處，用□表示。

十、《于清端公政書》中之幾篇序、跋，以及“新補”中錄自各種文獻之若干文字，原書無題者，本書視文意擬加題目；有作者姓名者，列於題目之下，以便檢索。

十一、《于清端公政書》首編“恩賜宸翰”之後，有“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五級臣于準敬錄”字樣；《政書》各卷之首，有“後學平江蔡方炳、西陵諸匡鼎編次，冢孫于準敬錄”字樣，因序跋中已有說明，故不保留。

十二、于成龍畫像與畫像背面之吳璵題辭，原在《于清端公政書》卷一之前，本書移置於全書插圖部分。

十三、本書增補文字取自正史、方誌、總集、文集、碑刻，以及于成龍後人所作，非信實可靠者蓋不收入。國家圖書館藏有民國年間東亞書局印行之《于人龍判牘》，而書中作者簡介却為于成龍；主編襟霞閣主、加評秋痕廬主，均不知何許人；案件情節與判詞，不見有關史料；判詞文體多為華麗駢文，與于成龍質樸文風大相徑庭。此書疑為書商為牟利而託名于成龍之偽作，故不收錄。

十四、《凡例》有所未盡者，分別見於本書中編者按語。

總序

戴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迹。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才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

* 戴逸：中國人民大學清史教授、博導，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

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為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質量；二為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為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為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了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聯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

學術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嫻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皮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皮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沈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折、錄副奏折。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國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

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中國，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國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獲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儀》、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制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斗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之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分，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嘆。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常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序一

薛延忠

巍巍呂梁，人杰地靈。數千年來，在這塊古老的黃土地上，孕育和涌現出無數志士仁人。被清康熙皇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于成龍生于明清更迭之際，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加之目睹明王朝的腐敗，親歷苛政戰亂加之於民的災難，形成了“積極入世、潔己愛民、伸張正義”的獨特性格。從順治十八年(1661)起，于成龍歷任縣令、州、府、道、布政使、巡撫、總督、尚書、大學士等職，為官二十餘載，治下政績頗佳，深得士民愛戴和朝廷賞識。

于成龍以“民”為社稷之本，深信“國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時刻把民生疾苦、地方利弊放在心上，“期以興利除害”，傾力安民惠民、消弭內憂外患；以“廉”為官德之首，仕官數十年如一日，清心寡欲、淡泊自甘，“署中薪米不給，至無衣可典或終日一食……”；以“實”為從政之要，講求“立誠”、反對“作偽”，常微服潛行，訪民間疾苦；以“嚴”為治政之綱，要求屬下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嚴其守又察其所守之真偽，勤其政又訪其敷政之寬嚴”，其治下“官吏望風改操”。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龍因積勞成疾，病歿于兩江總督任上，遺物“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康熙帝聞訊痛惜“朕失臂矣”，并親撰碑文稱為“清端”；江南百姓“巷哭罷市，家繪像以祀之”。

李志安同志組織編校的《于成龍集》一書，較為詳盡地收錄了于成龍的政

* 薛延忠：中共山西省委副書記。

書、詩詞、碑記等珍貴史料，以厚重的筆墨展現了于成龍求學、立德、從政的一生。它的付梓，對我們重溫歷史、認識先賢、做人從政，均大有裨益。

古人講，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以史爲鏡，可以知興衰。于成龍作爲封建社會的幹吏名臣，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所處時代和階級的影響與局限，但他在修身、安民、治政等方面的諸多理念和作爲，仍有許多值得今人學習借鑒之處。在當前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深入推進的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全面認識祖國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使之與當代社會相適應、與現代文化相協調”的重要指示精神，繼承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學習借鑒先賢前輩的情操修爲，進一步強化黨的宗旨意識，堅持以人爲本，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爲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做到權爲民所用、情爲民所系、利爲民所謀；堅持求真務實，勤政奉公，扎實工作，努力創造經得起歷史、實踐和人民檢驗的政績；堅持廉潔自律，修身立德，以對黨的無限忠誠，對人民的深厚感情，對事業的不懈追求，篤行講黨性、重品行、作表率之要求。

是爲序。

二〇〇八年五月

序二

聶春玉

李志安同志主編的《于成龍集》被列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文獻叢刊》，並將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這是呂梁文化史上的一件好事。《于成龍集》的出版，對於推動呂梁歷史文化研究以及名人文化旅游，乃至弘揚優秀民族傳統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特別是對黨政幹部思想道德、執政能力的培養教育等諸多方面，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呂梁，作為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在中華民族歷史的長河裏不僅創造了豐富多彩的優秀文化，而且哺育了許多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像一代女皇武則天、北宋名將狄青、清代名臣孫嘉淦等。其中，被康熙皇帝贊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不僅以他傑出的政治才能活躍在當時政治舞臺上，而且以他愛國為民、清正廉潔的政治品德和人格魅力，永遠留在中華民族的記憶裏。幾百年來，一直被廣大人民群眾以民間文學及其他不同的藝術形式久久傳頌。對於這樣一位廉能兼備的歷史人物，我們有必要對他的文集加以整理，對他的思想加以研究，對他的精神加以總結，並取其精華，發揚光大。緣於此，我抽暇閱讀了李志安同志送來的《于成龍集》樣稿，不僅被他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生遭際和政治作為所吸引，而且也為他閃光的政治情操和思想所打動。于成龍給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厚的精神財富，它不僅屬於呂梁，屬於山西，而且屬於全中國。我認為以下幾個方面，是值得特別強調的。

第一，民本觀。于成龍並非出自於顯赫的貴族階層，在出仕之前，他長期

* 聶春玉：中共呂梁市委書記。

生活在動蕩不安的社會底層，親眼目睹和感受過朝代更迭給老百姓帶來的不幸和苦難，加之他又受過良好的教育，儒家“達則兼善天下”的思想早已銘記於心。作為一名正直的有理想和抱負的知識分子，對飽受戰亂與自然災害之苦的人民群眾自然抱有極大的同情心，並把安邦治國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無論為國家計，還是為人民計，他都時時能從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出發，提出“地方之要，莫若安民”的政治觀點。每到一處，總是寬紓民力，拯救民生，澄清吏治，移風易俗，始終“與民同憂樂”，以“為民興利除弊”為己任，身體力行，使社會風氣為之一變，地方經濟文化得到了發展。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幹部應該大力弘揚優秀民族傳統文化，一切從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出發，自覺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加快發展步伐，化解社會矛盾，真正把我國建設成一個民主、富強、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第二，清廉觀。出仕之前，于成龍受過正統的儒學教育，形成了他積極向上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出仕之後，他始終能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並以此為標尺來衡量自己的一言一行，形成了他潔己愛民、愛憎分明的榮辱觀。赴地處荒僻邊陲的羅城時，好心的朋友勸他堅辭勿就，但他認為“荒徼皆王土，惟國家所使耳，人生仕宦豈擇險易！”走馬上任後，他插蒿棘為門，以土礫為几案，“扶病理事”，甘之如飴。在湖北，于成龍自奉節儉，惡衣疏食，不以為苦，反自認為在“民物凋殘”的情況下，正須益勵清介，磨煉自己。在兩江，于成龍每天只食粗米，佐以青菜，江南人呼為“于青菜”。遇到饑年，屑糠雜米為粥，舉家食之。客人來訪，也以糠粥待客，節省糧食，賑濟災民。在福建，外蕃來的貢船，對於成龍“或有所獻”，他都一概摒斥。于成龍身受清寒而廉潔自律，是以他高尚的情操和非凡的修養為基礎的。“不知榮辱，乃不能成人”，“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耻”。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政協十屆四次會議期間指出，要引導廣大幹部群眾與青少年樹立和堅持以“八榮八耻”為主要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我們要把樹立和堅持社會主義榮辱觀與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結合起來，不斷提高黨政幹部和人民群眾知榮辱、明是非、辨美醜的能力，真正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在社會主義榮辱觀教育過程中，大家讀讀《于成龍集》，我想一定會受到很好的啟發。

第三,法制觀。于成龍不僅是一位品德超群的廉吏,而且也是一位剛健有為的幹臣,特別是他的法制思想,至今都有積極的借鑒作用。在實踐中,他不僅注重教民知禮儀、講禮貌,而且注重建章立制,依法辦事。每到一處,他嚴格按照大清律法行政,並建立健全保甲制度、社會救助制度、鄉規民約等,作為地方性法規頒布執行。在整肅吏治方面,于成龍更是注重制度建設。他曾親手製定《興利除弊條約》、《示親民官自省六戒》等,使貪污、賄賂、私派、濫用刑法等種種腐敗現象得到了有效遏制。在法制教育過程中,于成龍特別注重方式方法。他親自把普法內容編成歌詞,刊印遍發城鄉,使之家喻戶曉,人人皆知。這些做法,在法制觀念淡薄的封建社會是十分有遠見的。

第四,政績觀。于成龍從政二十多年,始終能夠正確處理國家、人民與個人的關係。每當個人利益與人民利益以及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都毫不猶豫地不計個人得失,那怕是得罪上級甚至朝廷都在所不惜,絕不怕影響個人政績而有損人民群眾的利益。于成龍到四川合州的第二年,四川奉旨采辦楠木。巡撫給州縣的指示說:事關“欽工”,事在必行,“若着勤勞”,“定當特薦”。但于成龍不顧個人進退,上書直陳:此舉“勞民傷財,驚擾遐方”,拒不動用民力。這在封建社會的官場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在從政期間,不論是征收稅賦,還是上報災情,于成龍都不會因邀功而謬加征斂,或弄虛作假,浮誇假報,隱匿災情,始終做到實事求是,一切以社會穩定和人民安居樂業為出發點。這又是多麼的難能可貴!相比之下,當前我們的一些黨政幹部為做出政績,不惜損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大搞“形象工程”,大上“拍腦袋項目”。難道我們今日黨政領導幹部的思想素質,還不如一位封建社會的官吏嗎?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警惕,不得不令我們深刻反省。

總之,于成龍的政治行為和思想雖然有他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甚至糟粕性的東西,但我們應本着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達到古為今用的目的。這應該是李志安同志主編《于成龍集》的目的所在,也正是我所期望的意義所在。

是以為序。

二〇〇八年五月

序 三

董洪運

歷史長空，群星燦爛。浩瀚人文，彪炳古今。前清名臣于成龍即是其中的一員。雖然他離開人世已有三百餘年，但他的故事却穿過風雨滂沱的歲月，至今仍震撼着我們的心靈。康熙皇帝贊其為“天下廉吏第一”，謚之以“清端”。這對於成龍來說，是當之無愧的。

仲春時節，李志安同志送來由其主編的《于成龍集》文稿，邀我作序。因政務紛繁，初欲推却，復又思忖：于公乃是郡人，出其文集也是當地文化建設之舉，而一方“黃堂”，為之作序乃份內之事，故欣然允諾。粗覽文稿，靈臺驚動，感慨殊深。從于公的奏稿、書信、詩文的字裏行間，我看到了一位感人的廉吏，一位幹練的能臣，一位仁民的好官。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首先，于成龍是一位廉吏。這也是世人最為了解的一面。這一方面與康熙帝的贊譽有關，但于公的潔身清廉，從古到今也是少有的。在二十餘年的宦海生涯中，始終志行修潔，固守清儉。他在每一個職位上都嚴格要求自己，也嚴格要求屬下。清廉自守，率先垂範。初到羅城任縣令，他插蒿棘為門，以土礫為几案，日食二餐甚至日食一餐，習以為常。百姓憐其清苦，有時湊少許銀錢，供其購買鹽米之用，他均婉言謝絕；赴任合州，竟連路費也湊不足，全憑一善占卜之術的眇者隨侍方資以行；在湖北任上，于成龍益勵清介，惡衣疏食；在福建任上，外藩來的貢船，“或有所獻”，他一概摒斥。而布政使衙門裏

* 董洪運：山西省呂梁市人民政府市長。

薪米常常供應不上，他甚至將自己的衣物典當出去換食。任兩江總督時，于成龍一如既往，每天只食粗米，佐以青菜，江南人呼為“于青菜”。他嚴正聲明：“本部院下車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饋送。爾司道廳府州縣，務期共相砥礪，痛絕饋送。”或許有人質疑，堂堂封疆大吏的總督，生活如此清苦，是不是在做秀呀？不是的。清朝初期官員的俸祿是極低的。一個縣令年俸不足五十兩銀子，一個總督年俸僅百餘兩，而應由他自己開銷的費用是根本不够用的。到了雍正帝“耗羨歸公”改革以後，官員的俸祿才大幅提高，方有了養廉的本錢。于成龍病逝後，將軍、僚屬檢點遺物，“見周身布被、袍一襲、靴、帶各一，堂後瓦瓮米數斛，鹽豉數盞而已”。四壁蕭然，無異寒士。我想，這就是最廉潔的官了，即使再過一萬年，這種清廉之風，也仍然是做官人的榜樣。清正廉潔的官吏對一方風氣是最大的引領者。時至今日，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其次，于成龍是一位能臣。清順治十八年（1661），于成龍被授為廣西羅成縣令，時年四十五歲。按說出仕並不算早，比起他孫子于準還很年輕時就做了大官，那就差多了。但他做縣令、知州、知府、布政使等職務時，都政績卓著。他是一位很能幹的官，再難的事他都能擺平，再危險的事他都不怕，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託付給了所從事的職守。生命對他來說只是完成職守的軀殼而已。于成龍在其位、謀其政，只要是於國計民生不利的弊端，他都會千方百計地去革除。出任武昌知府時，因事被革職後，臨危受命，為穩定地方治安，他不顧個人安危，單騎深入虎穴，成功安撫、化解了東山之亂。為了剿滅盜匪，他曾不顧安危，扮為乞丐，混跡其中，摸清底細，一舉打盡。他的治吏之舉也曾蜚聲南國。于成龍每遷任一方，都政績卓著。他是幸運的，三次遇上了好上司，三次被舉“卓異”。沒有卓著的政績，怎麼會有“卓異”的升遷呢？翻開《清史稿》，我們能看到他一路走來的幹練有為、披荆斬棘的足跡。

第三，于成龍是一位仁民的好官。他長期生活在偏遠的呂梁山區，又恰逢明末清初動蕩歲月，黎庶之苦，感同身受。無論在哪一個崗位上，他都敢為民請命，不避斧鉞。于公每到一處，特別注重獎勵農耕，勸導民衆“廣植桑麻，多浚井泉”。凡因勤勞而獲豐收的，獎予旌旗；因懶惰而致荒蕪的，予以斥責。遇有災荒，他便條陳減免賦稅，開倉賑濟。他曾冒死為冤獄民衆請命得免。

他很重視教育，在黃州戎馬倥傯之際，仍然“以其隙招致文學之士，講經論學”。到江南後，又創辦虹橋書院，選擇高材生講習其中，並且親自訓課。對於科舉考試中的種種弊端，經過查訪，專門下令各省學政“實心痛改”，要求他們“正此率下”。在他的倡導下，地方上興教重教之風大行，培養出了大量的人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于公把庶民的苦看作自己的苦，把庶民的樂當作自己的樂。這不正是古之先賢仁人的胸懷嗎？

行筆至此，我不禁撫案長思：是什麼原因使于成龍如此清廉、如此勤勉、又如此仁民呢？竊以為從以下三條中，或可找到于成龍心性、行為和品格的根源。

第一，業於儒學，是他積極入世救民、有所作為的動力。于公生於明末呂梁山上一個破落的官宦之家，從小受到良好的正統教育，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士人價值理想，深深地植根於他的心中，形成了其憂國憂民、濟世行道的政治抱負。因此，在他四十五歲被授為廣西羅城縣令時，親朋好友因其地荒僻、蠻烟瘴氣、人跡稀少，力勸堅辭勿就。但他認為“荒徼皆王土，惟國家所使耳，人生仕宦豈擇險易！”於是毅然決然遠赴邊陲。說穿了，他不是要做官，而是要幹事，要踐行他的價值理想。這正是儒家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象。

第二，兼容佛道，是他絕泐物欲、參透人生、恪守清廉的修養根源。于公曾在太原的崇善寺和本郡安國寺潛修儒業，兼學佛道。特別是他出仕前曾在安國寺讀書數年，除儒學之外，他攻修了不少佛學經典。這對他往後為人、為官與處事影響很大。他相信因果報應，講究天理良心，提倡清心寡欲。這使他在極其艱難困苦的仕途中，守得住清貧，挺立着道德人格，不為任何物欲所動。他的精神世界裏始終是一派澄明景象，他以出世的修養成就了入世的功業。在他身上實現了儒佛道思想的完美統一。

第三，特異的個人稟賦，是于成龍為千年少見品材的物質支持。我們要相信個人稟賦的差異。學儒學佛的官員為數不少，為什麼偏偏于成龍修成了“正果”呢？這就只能從他個人的特質中去尋求答案。于成龍的故鄉，地處呂梁山脉中段，往西幾十公里便是晉陝大峽谷中的滔滔黃河，往東幾十公里是汾河谷地，汾河是山西人的母親河；北面不遠便是著名的道教聖地北武當山，

南面很近即是漢開郡府的離石城及建於唐貞觀年間的安國寺。這裏山川鍾靈，人文厚重。在這樣的方域之內，生發養育出一個于成龍式的人物應是不足為怪的。他的基因注定了他是于成龍。

如果有讀者能耐住性子，平心靜氣地讀完《于成龍集》，那比只看《一代廉吏于成龍》電視劇勝過百倍。一個真實的、全面的、鮮活的于成龍就會浮現在您的眼前。不論您是仕農工商，靈魂都會受到一次洗滌，精神世界都會得到一次淨化，其裨益是不言而喻的。于成龍是一位古人，但他所彰顯的永恒價值，與我們的時代精神是一致的。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不正需要千千萬萬的公正廉潔、為民勤政的好官嗎？

是為序。

二〇〇八年暮春於呂梁山寓所

序 四

王思治

山西方山縣，清代屬永寧州，是康熙稱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的故鄉。

二〇〇三年八月，李志安同志蒞任方山縣長，有感於歷史名人于成龍之生平事迹，於積極實施強縣富民舉措之際，於政務繁忙之餘，致力於于成龍文史資料的收集，親任主編，奔走於各大圖書館，數易寒暑，以《于清端公政書》為藍本，網羅碑傳文等資料，整理而成《于成龍集》，納入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之一種出版發行。李志安同志對事業執著的追求精神確實難能可貴。讀初稿後，欣然遵囑為之作序。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生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出身官宦之家。崇禎十二年（1639），鄉試中副榜貢生，因念其父年高，不仕。入清後，順治十八年，父憂服闋，出任廣西柳州羅城知縣，先後歷官四川、湖廣、福建等地，晚年任直隸巡撫、江南江西總督。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於兩江總督任上，終年六十有八。

于成龍起自州縣，以清廉聞於時。任直隸巡撫時，康熙於懋勤殿召見，當面稱譽說：“爾為當今清官第一，殊屬難得。”于成龍之所以能成為康熙朝難得的第一清官，確有他人不及之處。

大學士熊賜履，理學名臣，與于成龍為摯友，自謂“辱公為肺腑交，與聞公生平甚悉”，與于成龍相知相識甚深。熊賜履說，三代而後，以廉幹稱者，代不

* 王思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導。

乏人，然多矯飾沽名，或行事偏執刻厲，因而表裏始終，往往難言之。于成龍則不然，其人之清廉是“質任自然”，故而“誠中形外”，乃是出自內心，所以“略無矯強刻厲之迹”。其清廉一本於“意誠”，故其之得衆望，“直有超越於古人之上者”。一言以蔽之，于成龍清廉自勵，是出於至誠，故熊賜履感慨言之：“然後嘆公爲真不可及。”

于成龍歿於兩江總督任上，諸司哭臨，見其遺物綈袍一篋，鹽豉數器，“空齋弊帳，篋無十金”，南京之民呼號哀慟。翰林院侍講彭定求“聞風仰止”，嘆曰：“（于成龍）清苦刻厲，躬行至誠以動人。”

在清代，大凡循吏有惠政賢績於地方，則稱爲“名宦”，死後民人感念不忘，合祠以祀，“其猶粹者，間或有專祠”。于成龍歷官多省，所至往往有專祠，如羅城、黃州、江寧（南京）、蘇州。清人說，專祠者，“用以志不泯之意”，因其“遺愛在民，歷久彌新”。于成龍又一有別於他人之處，是才、學、氣俱備。大學士陳廷敬說，清官廉吏者，有人或短於才，或有才而疏於學，或乏魄力而少氣壯，是故“君子惜其用廉之未盡”，而于成龍則三者皆備，“獨盛推于先生”。正因爲于成龍至誠於中而又有才，惟其誠與才合，故所至能集大勛而著令名。

于成龍有言：“讀書宜明行術，不徒虛聲，以盜名譽。”其嗜學重在踐行，人稱其“爲學務敦實行，不屑詞章之末”。于成龍有名言曰：“學者苟識得道理，埋頭去作，不患不到聖賢地位。”彭定求講過一個故事：康熙曾在西苑豐澤園，以“理學真僞論”命題，面試詞臣，交卷時，康熙說：“理學無取空言，若于某（指于成龍）不言理學，而服官至廉，斯即真理學者。”學與行相符是于成龍清廉的又一特色。

康熙曾御書“激濁揚清，始終如一，清潔之操，白首彌勵，真國家之可重，人所不能也”，以賜于成龍。清廉操守，始終不移，“白首彌勵”，是與其起自牧令分不開的。于成龍首任羅城縣令。羅城原屬南明永曆政權，順治十六年，始爲清所有，兵燹之後，荒涼殘破。越年，于成龍來官此荒城，艱辛備嘗，深知民人困苦。遷四川合州知州，四川大亂後，州中遺民才百餘，正賦僅十五兩，而供役繁重。臨民之官的于成龍嘗言：“我奉天子之命，來撫茲土，以惠養斯民也。”乾隆二十三年，金岳任羅城縣令，爲于成龍建專祠，在其所撰碑文中說，于成龍由州縣官而至督撫，清操“不渝始終”，是得益於任羅城縣令時，“堅

忍磨勵，以厚其基，譬如干將、莫邪，百淬百練，以成其鋒。是以保乂羅者，公也；玉成公者，羅也。”

于成龍生平事迹概述，已見於他序。讀本文集之碑傳文，則更能得其詳。不贅。

《于清端公政書》原名《于山奏牘》，由于成龍門人李中素編次。原稿片紙隻字皆于成龍親筆細書，由於各稿分別寫於二十多年間，有的霉蠹沾蝕，字迹或有脫落。李中素伏讀十許日，“匯其可識者爲若干卷”，則其難識之原稿或未編入。《政書》是于成龍歷任之作，任監司以前，皆爲各類公文與檄文、戒諭之作；任巡撫後，始列奏疏。第八卷曰《吟詠書》，爲各體詩作，並以文附後。本書以康熙本《于清端公政書》爲底本，增補于氏遺文，匯集多種研究資料，較之原書，尤臻完備。其校勘、標點，堪稱精當。

《于成龍集》的出版，是地方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一件盛事，對地方歷史名人文化旅游及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同時，也將嘉惠學林，促進清史研究。

是以爲序。

二〇〇八年四月

序 五

李志安

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的熱播，使于成龍這位康熙王朝的重臣再次譽滿天下，也使我對這位清代廉吏有了初步的了解。

二〇〇三年八月，經中共呂梁地委公開選拔，我被選派到方山縣任政府縣長。方山是于成龍故里，亦是呂梁數一數二的貧困縣。在方山工作的日子，我不僅為方山經濟極度困難的狀況吃驚，更為方山潛在的發展優勢所振奮；不僅為方山人民日益高漲的建設激情和不懈的斗志所鼓舞，更為方山人杰地靈和深厚的人文底蘊深深吸引。任職三年，立足縣情，積極發揮方山獨特的優勢，大力實施“興產業、創園區”等“強縣富民”之策，親歷并見證了方山奮力拼搏、負重趕超的火熱實踐，親歷并見證了方山快速崛起、成功跨越的創業歷程。在致力於經濟發展的同時，出于對於成龍品德和政績的傾慕，亦認識到保護挖掘文化歷史資源，對地方經濟開發潛在的巨大推動作用，我萌生了“打造于成龍文化品牌”的想法，并開始着手有關文物史料的收集、整理等工作，研究探尋于成龍為官治政的歷史軌迹及其思想淵源，鑒古察今，借古勵己。二〇〇六年調中陽縣任職后，我仍盡力把這項工作做好做到底。在我看來，于成龍不僅是方山特具的無形資產，亦是呂梁尚待開發、極為寶貴的歷史文化財富；研究開發于成龍文化，不僅對方山有益，而且對弘揚呂梁精神、推動市域經濟社會發展而言亦不失為一件好事。正是基于這種認識，遂有了這本集子的出版。以下為編輯本集時所歷所感，贅述為序。

* 李志安：山西省中陽縣人民政府縣長。

(一)關於于成龍文稿

于成龍(1617—1684),字北溟,晚號于山,今山西省方山縣北武當鎮來堡村人,明崇禎十二年(1639)舉爲副榜貢生。清順治十八年(1661),四十五歲的于成龍以布衣之士任廣西羅城縣令。在之后二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中,歷任廣西羅城知縣,四川合州知州,湖北黃州知府,江防道員,福建按察使、布政使,直隸巡撫,兩江總督等職。由于他出色的治政才能和突出的政績,三次被舉爲“卓異”,得到地方政要、康熙帝的信任和賞識。康熙二十三年(1684),因積勞成疾,病歿于兩江總督任上,葬于故里方山縣。

有幸來到于成龍故里工作,我深爲方山曾有這樣一位杰出的歷史人物所驚嘆,更爲于成龍“清操自守、潔己愛民”的爲政風範所折服。我深切地感到自己理應對于成龍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以其精神激勵自己盡職盡責,激勵故鄉人民改造山河。爲此,我多次到于成龍故居等處考察,聽鄉親們講述于成龍的傳奇故事。爲了進一步研究于成龍的思想軌迹,我開始查找有關於于成龍的文史資料,特別是其本人文稿之類的東西。然而,結果令人十分遺憾,遺憾的是在方山縣竟未找到于成龍本人留下的片紙遺章。我覺得無論是什么原因,在于成龍故里找不到于成龍文稿,怎么也說不過去。

懷着對這位同樣任過縣官、政績“卓異”的方山“老鄉”的崇敬之情,懷着傳承其精神的想法,在做好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尋找于成龍文稿便成了我的“業餘”任務,成了我必須主動擔當的“額外”歷史責任。於是,我四方打聽,到處探訪。終於,從一位友人處得知某圖書館有《于清端公政書》。隨後多次聯系商談,次次碰壁;枉跑之后,再聯系,再前往。真情所至,總算感動了“上帝”,便有了這次我們編印的文稿藍本。

前段時間到國家圖書館查找有關史料,才知道有關於于成龍的文稿僅在清朝時刊印過,建國后未曾再印。本集的出版也算是填補了于成龍研究的一項空白,爲此我很興奮。

(二)關於于成龍文物

于成龍歷史地位十分重要,其現今的研究、借鑒、開發價值更不容忽視。我認爲作爲于成龍故里的縣政府,有責任讓這位呂梁人民引以自豪的歷史人物盡快浮出泛黃的歷史,像開發北方道教名山——北武當山一樣,將于成龍

打造成方山縣精美的“文化名片”，吸引更多的人到方山旅游，觀于成龍“卓異”政績之依托，學于成龍勤政廉潔之操守，探于成龍治政思想之根源。於是，縣政府千方百計籌措款項，從二〇〇五年開始，首次收集散落民間三百多年的于成龍文物八十多件。與此同時，縣政府策劃了于成龍開發項目，積極對外招商引資，試圖同方山厚重的道教文化優勢、山清水秀的生態環境相結合，着力打造“道教文化游、自然生態游、名人故里游”三大旅游品牌，試圖使于成龍這一寶貴的、不可替代的歷史文化資源，在促進方山脫貧致富方面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試圖使方山人民優秀的傳統文化傳承開來。

（三）關於對於成龍的贊譽

作為清初杰出的政治家，于成龍大力整飭吏治，嚴懲貪腐，清除陋規，免稅賦，輕徭役，賑濟饑民，平反冤獄，獎勵農桑，興學育人。這些政績反映了他以“為民興利除弊”為己任的治政思想和杰出才能，體現了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官德修養和崇高境界。特別是他位列封疆，官至一品，始終做到克勤克儉，廉潔自守。不論任縣官，還是當總督，生活艱苦樸素，自奉節儉簡陋，每天只食粗米，佐以青菜，江南人稱其“于青菜”。去世后僚屬檢點遺物，只見四壁蕭然，無異於寒士。故而康熙帝贊其“高行清粹”，標榜為“天下廉吏第一”，這是眾所周知的。鮮為人知的是，于成龍的品行不僅為康熙帝所贊譽，亦被乾隆帝大加贊賞，給予于成龍很高的評價，親筆題詞“清風是式”，樹為清廷廉潔從政的典範。這個題詞是我們在查找資料過程中偶然發現的，方山縣志沒有記載。據研究于成龍的專家學者講，他們從來沒有聽說過，更沒有見過此題詞，因而彌足珍貴。

二〇〇三年，上海京劇院創作演出了新編歷史劇《廉吏于成龍》，在全國再一次引起極大的反響。該劇共演出百餘場，贏得了社會各界廣泛的贊譽。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在中南海懷仁堂演出《廉吏于成龍》后，胡錦濤總書記握着于成龍的扮演者、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尚長榮同志的手說：“編得很好，唱得也好，有警示作用。”又說：“這戲有教育作用，要多演。”

于成龍生活於三百多年前的清朝，其思想、行為具有當時的特質，但其為官治政的理念及人格魅力至今仍閃耀着熠熠光輝。在全面貫徹落實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的“八榮八耻”社會主義榮辱觀、建設和諧呂梁的今天，我覺得應

該把弘揚傳統美德與高揚時代精神有機地結合起來，進一步提升民衆的道德素質和精神品格，特別是提升各級領導干部的官德修養和自律意識，從而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最先進的思想文化支撐和強有力的組織保障。有鑒於此，我們組織整理刊印了《于成龍集》，以便於更多的人學習、研究、借鑒、探求其思想脈絡，傳承其精神於今天，傳播其品行於后世。這便是我們的初衷與目的。

《于成龍集》整理編輯工作，得到了山西省委、省政府和呂梁市委、市政府領導的極大關懷和支持，得到了有關專家、學者和許多有識之士的指導和巨大幫助，在此一并深表由衷的謝意！

二〇〇八年五月

目 錄

總 序	戴 逸(1)
序 一	薛延忠(1)
序 二	聶春玉(3)
序 三	董洪運(6)
序 四	王思治(10)
序 五	李志安(13)

首 編

恩賜宸翰

任直撫時蒙頒上諭一道	(1)
任直撫時蒙賜御製御書詩并序一道	(1)
賜葬時蒙賜御製御書碑文一道	(2)
第一次諭祭文	(3)
第二次諭祭文	(3)
御書扁額	(4)
御書對聯	(5)

《于清端公政書》原序	李中素(6)
------------------	--------

《于清端公政書》原跋 劉 鼎(8)

政書卷一

羅城書

條陳引鹽利弊議 (9)
對金撫臺問地方事宜 (11)
再陳粵西事宜 (13)
治羅自紀併貽友人荆雪濤 (16)

合州書

請復祀典詳 (19)
請正朝儀詳 (20)
查採楠木詳 (20)
規畫銅梁條議 (22)
上提督請留合州營防兵揭 (23)

武昌書

爲武昌各屬請緩徵詳 (25)
請復臨湘驛站詳 (25)
飛報收復蒲圻詳 (26)
規復蒲圻上王憲副稟 (26)
籌畫蒲圻防守詳 (27)
上張撫臺籌報各屬情形稟 (27)
報咸蒲浮橋被水衝壞情形詳 (28)
呈報委撫東山起程日期詳 (28)
初撫東山遣牌 (29)
勸畝間歸農諭 (29)
安慰各堡諭 (30)